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性質

1949年，西德在戰後重建時，制定《基本法》（*Grundgesetz*）做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立國基礎。《基本法》的第3條第2款如此規定：「男女有平等之權利。國家應促進男女平等之實際貫徹，並致力消除現存之不平等」（*Artikel 3 des Grundgesetzes*）。這種對於兩性平等的倡議，在形式上完全脫離之前希特勒所統治的第三帝國時期中對於女性的歧視；而女性的社會地位、政治參與或相關權益，比起威瑪共和國或更早的德意志帝國時期也更為提升。

然而，女性長期在歷史中受到壓抑的地位並沒有因為一紙條文即能立刻翻轉。以教育機會而言，1960年代德國社會學者Dahrendorf即以「鄉村天主教工人少女」為圖像，標幟出當時教育不平等的狀況（Baumert, Cortina, & Leschinsky, 2005）。在這樣的背景下，1960年代以降，一方面為了使德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保有競爭力，另一方面，則是鑑於當時教育參與所呈現的機會不均現象，德國因此進入教育擴張期，希望透過教育規模的擴增與建立，讓更多人能夠進入教育體系，藉此彌補因為先天或後天所帶來的種種成就差異，進而促成人人在起始點上具有平等的地位（Handel, 1985）。

當時的教育擴張，的確為女性帶來了更多的參與機會。以中等教育而言，德國的中等教育主要分為三支：主幹中學（*Hauptschule*）、實科中學（*Realschule*）與文理中學（*Gymnasium*）。簡要言之，進入文理中學的學生，成績通常最為優異，其後升學路徑為進入一般大學就讀；實科中學結業後，可進入專科高等學院就讀，其畢業後所獲資格通常為白領階級工作；而主幹中學的結業資格則多為藍領階級工作。早在1995年時，除了主幹中學中女性的比例仍稍低於男性外，其他不管在實科中學或文理中學，女性的就學數量都略多於男性，所占比例皆為51.9%（Hradil, 2001）。這樣的現象到了2012年改變亦不大。根據聯邦統計處（*Statistisches Bundesamt*）的最新資料，女性在文理中學所占比率為51.9%，在實科中學的比率有49.3%，主幹中學的比率則為45.9%（*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2a）。

同樣的擴增效果，亦延展至高等教育階段。1960年，女性大學之入學率為27%，遠遠低於其男性同儕（Hradil, 2001）。但到了2000年，其所占比例已提升至49%。甚至在2009、2010與2011年，女性大學畢業生的比率都超過男性，分別達到

51.0%，51.4%和50.7%（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2b）。

從參與率來看，性別間之不平等似乎獲得解決。而教育擴張的結果，對女性來說，無論在自主空間、健康狀況或政治參與上，都帶來一定程度的提升（Klemm, 2005）。然而，若將分析面向做更細緻的區分，或把就學年限繼續向上延伸，則所謂的平等參與率，帶來的也僅是部分的平等。女性所遭受的忽視與歧視，並未從此杳然無存，而是在其他層面上反映出性別差異，例如：在學校類型或在大學科系選擇，以及之後接應的職業路徑上（Baumert et al., 2005）。

以高等教育的機構類型而言，在以實務為取向的專科高等學院（Fachhochschule）中，其所設置的科系以工程、經濟、健康、社會、農業、林業、媒體、資訊等為主，對女性來說較不具吸引力；反之，較獲女性青睞的保育、醫護等科系，在職業分類上卻不屬於高等教育的職業領域（Mayer, 2006）。即使在大學男女就學所占比率旗鼓相當，然而，隨著學術路徑向上攀升，女性所占的比率也跟著往下沉降。以2011年為例，大學階段女性畢業生所占比例為50.7%，但到了博士階段則降至44.95%；而真正進入學術生涯者，達到教授中最高等級者，其比率更僅僅剩下10.7%（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2b）。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這種女性在學術系統中隨著職位上升而參與比率下降的狀況，並非德國之專利。以臺灣教育部2013年的統計資料來看，女性在大學的就學比率與男性相當（教育部統計處，2014a）。然而，在碩士階段時，女性比率則降為43.4%；到了博士階段更僅有30.5%（教育部統計處，2014b）；至於學術系統中，女性助理教授比率為38.39%，副教授為31.33%，教授一職的比率更是下降至19.61%；而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女性擔任一級主管者，比率也僅有23.35%（教育部統計處，2014c）。

同樣地，高等教育中科系性別隔離的現象亦清楚可見。不論是劉正與陳建州（2007）以教育部所公布1972至2003年期間，所有大專院校各科系一年級學生資料為基礎，或是謝小苓、陳佩英與林大森（2011）分析高等教育資料庫94學年度大一新生之調查資料，又或者是陳婉琪與許雅琳（2011）針對1982至2009年高等教育各層級、各系所之畢業生人數資料的分析，都指出高等教育中的性別隔離現象。

有鑑於女性在高等教育學術工作上的低比率現象，德國在1970年代即已開始發展出各種相關研究（Lind, 2007），並累積數量極多的研究文獻。而重要的學術諮詢